

中国人民大学

世界通史教研室



苏联史教材



北京 1957年

书号：107 印号：166 Ⅲ編輯59千字

1957年4月30日出版（365+2+3）

紙張材料費 0.35 元



說 明

這是在本校歷史系講授蘇聯  
史的講稿，只供本校歷史系同學參考。

中國人民大學世界通史教研室

## 第二十三讲

1825—1850年的对内外政策

I、尼古拉一世的专制制度

II、尼古拉一世政府的对外政策

① 东方问题

② 1826—1828年的俄伊战争

③ 1848年的欧洲革命与尼古拉一世

参考书 苏联通史二卷八章三三节 三六节

九章三八节 三九节

## 第二十三讲

1826—1850年俄罗斯帝国的对内  
对外政策

## (一)尼古拉一世的专制统治。

1825年彼得堡参议院广场上群集十二月革命党人之时正值尼古拉一世登位。尼古拉一世亲手枪杀了这一次，也是俄国第一次反对专制制度的公开的武装行动。他眼光短小，刚复自用、暴虐之极。他为革命运动吓得半死。他自幼就仇视革命与民主制度。十二月党人起义后他说：「革命就在俄国的门口。但是，我起誓：只要我还有一口气，革命就进不了俄国。」尼古拉一世感到革命已在俄国孕育、滋长，贵族国家的基础已经动摇；便以全力实行高压政策，逮捕、监禁、鞭笞、苦役、屠杀想以此保住专制农奴制。列宁在谈到封建与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两种方法：暴力与欺骗时，认为尼古拉一世对俄国人民是极尽残暴之能事的。尼古拉一世以前的沙皇在对内政策上有镇压也有让步，但他的对内政策就只镇压没有让步。尼古拉一世认为自己统治生活的目的就在于使革命无法蔓延。

1826年初农民运动起波浪汹涌，蔓延好些州特别是乌克兰。国家农民拒缴租税。地主农民拒绝服劳役。尼古拉一世在枪杀了十二月党人，镇压了农民运动以后，决定亲自集中地领导政治警察的活动。1826年7月3日颁布特别命令建立第三厅，下设宪兵军团。全帝俄分作7个宪兵区，每区由一宪兵将军管辖。每州任命一宪兵司令此外尚有所谓高级秘密警察协助宪兵行动。第三厅的行动以沙皇为靠山，不受现存法律的限制。它的组织遍及各地，有着高于一切国家机关之上的高级的监察与惩罚的力量。白色恐怖猖獗，监狱、要塞、警察室、拘留所、教堂的地窖都监禁满了所谓的「被揭露者」与纯粹的

被怀疑者。

沙皇及其特务机关都认为自由思想是文学与学校传播的，因此特别注意它们，向它们进攻。1826年政府颁布新的书报检查条例，谓之「铁律」。禁止怀疑宗教教律，不满沙皇及专制制度、建议改革的书籍出版。自然科学与医学书籍若与宗教教义相抵触也禁止，任何以唯物论为基础的书籍也遭禁止。进步期刊杂志、甚至某些儿童读物也遭封闭，编辑被流放遍及全国的书报检查委员会则展开了向文学与学校的真正反动的进军。

政府在教育方面的反动措施是以当时的教育部長希什科夫的理论为根据的。他的理论是：科学只有像盐那样，按照人体的需要，酌量予以运用和传授的时候才有用。因此政府推行公开的封建等级教育制度，因为政府认为在劳动人民中间传播教育，对于专制制度是危险的事。在希什科夫的提议之下，政府于1827年颁布「只允许有自由身份的人在大学和其他高等学府中所课」的敕令。换言之，就是禁止农奴子弟进高等和中等学校。敕令中露骨也写道：「在中学和其他高等学校中」教育农奴「……可以造成双重的危害——」获得教育后的农奴对专制制度是很危险的，因为他们的高等学府中「……习惯于和他们身份不相称的生活方式、思想方法和概念」。（苏联史文选，第2卷，第625页）这就是说明，专制制度害怕从这些大学生当中涌现出反对自己的敌人，于是便竭力使受压迫的群众生活在愚昧无知的状态中。出身微贱的人只能入一年制的教区学校学习最初级的文化。商人、手工业者及其他城市居民的子弟可上三年制的县立学校，学习比较广泛的课程，如神学、语文、数学、物理。七年制中学为贵族、官吏子弟开设，教授古今语文、物理、音乐、剑术、舞蹈。所有学校都施行体罚。教育的首要任务是使学生应崇拜与统治当局。

1830年，法国、比利时、波兰都发生了革命，国内群众运动高涨，因而尼古拉一世的反动更加倍了，沙皇查禁更甚，吹毛求疵，处处挑剔。例如1836年关闭了《望远镜》杂志，因为它刊登了查达也夫的「哲学书简」，藉文指责了俄国政治和文化的落後。因此，沙皇政府下令封闭了杂志，並宣称查达也夫是疯子。1833年反动分子烏瓦洛夫出任国民教育部長。

1835年頒新大学章程。大学失去了科学学府的意义，剥夺了自治权，完全处於地方教育督学的监督之下。哲学、政治经济学、統計学等教研室撤銷，將神学定为必修課程。学生与教授都受政治监视。进步者受排挤、驱逐。学费增加。

烏瓦洛夫为了对抗革命思想而制訂了反动的「正式民族性」理论。它包括三方面：希腊正教、专制制度、民族性。希腊正教被认为是最高尚、最靠近上帝的教派，而俄国自公元988年就採用了此一教派。专制制度是最好、最合宜於俄国的制度，破坏它，就破坏了俄国生存的基础。根据民族性理论的看法，俄罗斯是最高尚的民族，俄国其他民族是弱劣的，应该俄罗斯化。俄罗斯民族的遗产全是好的，俄罗斯历史道路独特，没有阶级矛盾。

沙皇政府还进行了編纂法典的工作，还在尼古拉当朝的初期就設立了特别第二厅，实际上由斯畢朗斯基领导制訂新的法典。1830年两卷集的《俄罗斯帝国法律全书》问世，此仅为法律史料。1832年頒布新法典，共15卷，彙集全部現行法律。此法律彙編只是技术上的編纂，無本质变更，其目的在保护、巩固現行的社会政治制度。自然它在整頓奴农制国家机器上起了一定作用。

为了巩固贵族等級及其权利，1831年的宣言提高了选举权的财产资格标准。1832年法典建立新的等級——世袭一等爵公民与个人荣誉公民。凡贵族子弟，受过一定教育教

会人員、大資本家都可成为「荣誉公民」。二者皆可免除徭罰、兵役及人头稅。这是在旧的等級制形式下給新兴资产階級一些特權。1845年法律規定不少於10万俄畝或400农产的貴族世袭地产由長子繼承，不得折散与轉讓，以此巩固貴族的物質地位。

这就是說明，尼古拉一世的对内政策是具有維護农奴制性質的。这里应当指出M. H. 坡克羅夫斯基的觀點，他認為大地主阶层和资产階級的联盟构成了尼古拉一世政策的基础，他認為这种联盟的目标是反对中、小地主阶层的。这种觀點是錯誤的，因为把貴族内部的矛盾說成是階級矛盾，由此引伸到否認專制制度政策所具有的真正的階級基础，从而低估了农民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

沙皇政府虽然尽力巩固地主权利，但客观的形势迫使他不得不放意农民问题。这个客观形势就是多次的农民騷动。例如：1839年因旱災引起的12州的农民騷动；40年代中，有14州的农民进行群众性的迁移（迁往高加索，及其他边区）运动等。因此，宪兵司令本肯道尔夫向沙皇报告道：「农民的情緒是帝国脚下的火药庫」。在这种情况下，沙皇政府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召开秘密委员会来討論农民问题。但这些秘密委员会的成員多是大官吏大地主，所以他们同意在不动摇农奴制的基础上来談农民问题。在1826—1850年这段时期内，专制制度曾好几次企图解决农民问题。例如，在1826年12月6日的委员会中，討論了斯畢朗斯基的草案。斯畢朗斯基草案的精神是要把农民「束縛」於土地上，而不是「束縛於」主人。經委员会討論後，作出的草案規定：禁止任何一种不带土地轉讓农民的做法，禁止販賣农民；關於家僕的法令，限制地主把自立农民轉变为家僕的企图，並且創造了許多條件，強迫地主縮減家僕人数，在委员会的草案中同时也規定，地主不仅有权



262

带土地释放自己的农民，并且有权不带土地（自然要得到农民同意）释放自己的农民。仅仅这种微小的措施也引起了贵族激烈的反对，尼古拉一世见到这种情况，改变了最初赞同草案的态度，而是毫不犹豫地不批准草案。

1835年重新建立了秘密委员会，制订逐步，“消灭”农奴制度的计划。根据委员会的意见，是要使农民失去土地得到自由。实际上，这个计划丝毫没有触动农奴制的基础。就连这个计划也没有得到任何实践。

1839—1842年初另一届秘密委员会的工作是进行“改变农奴生活的问题”。由于农运高涨，统治阶级深明明白，要保留农奴制度，必须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一下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如此，政府最初通过实行“财产登记”的方法来实现。所谓“财产登记”就是规定签订特别的条约，在条约中正确地规定了农民份地的大小，以及因使用份地须服的义务。但是，政府这种干预地主同他的农奴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尝试遭到贵族激烈地反对。因此政府只得让步。1842年4月颁布的“义务农民”法令，就是这种让步的后果。“义务农民”法规定地主根据同农民签订的“相互协议”，有权签订关于农民服义务使用土地的条约，地主保留“对世袭土地所有制的全权”，并且保留世袭领地的治安权和审判权，由此，农民份地的大小和义务的多少全由地主决定，这样看来，农民连带土地，或者不连带土地的解放，完全听凭地主了，根据这法令，三家地主将24000人中登记人口变为义务农民，这一数目约占地主农民总人数的0.25%

这些改革中最重大的一项是1837—1841年间实行的有英国农民的改革。此项改革的目的在于，通过稍微增加耕田不足的乡村的份地，组织有计划的移民，平均代役租的征收，改善技术和进行各项文教工作这些途径，把国有农民的农村变为示范农地

242

的模范村。为进行此项改革，建立了国有财产部，部长是基西略夫，因此，有时把此改革称之为基西略夫的改革。又建立一些地方机关。这样改革的结果，使国有农民处在极为复杂的管理制度中，国有农民在表示他们对改革的抗议时曾这样说：从前我们是国家的，现在把我们卖给基西略夫领地了。因此，在1841—1845年间曾发生过好几次国有农民的起义，以表示对改革的抗议，其中最大的有乌拉尔区，车里亚宾斯克县和慶德林斯克县的国有农民的起义。由此可见，国有农民的改革并没有改善农民的状况。但这个改革在某些方面加速了农奴制度的解体，因而在客观上曾起了进步的作用。

总的说来，沙皇政府进行的改革都是卫护农奴制度的。例如，1848年3月12日尼古拉一世在接见彼得堡的贵族代表团时，曾毫不掩饰地说明这一切改革的卫护农奴制的本质，他向贵族们保证道，贵族们尽可以放心，如果全体贵族们团结一致的话，外界的敌人（指1848年的欧洲革命）是不足畏惧的，他向贵族们保证，他尊重贵族的土地私有权，视为神圣。『当我公佈关于农民的法令时，我曾宣布道：全部土地都屬於贵族——地主，这是一件神圣的事，是誰也不能侵犯的事。』（苏联史文选第2卷第661页）

尽管沙皇制度用尽一切努力来延缓封建农奴制度的崩溃，但历史的辩证法是违背了农奴主希望农奴制的永存的主观愿望。社会的客观发展必然要将农奴制引向於复滅。尼古拉一世时俄国经济发展的事实表明了农奴制正处於瓦解过程之中。此时期的特点是商品货币关系在俄国进一步的发展与增长，而摇摇欲坠的农奴制却又多方面地阻碍它的发展。俄国日益落后於西方的先进国家，俄国人民遭受到深重的灾难。

尼古拉一世政府的对外政策：

尼古拉一世政府的对外政策可分成三个阶段：

(1) 1825—1848年 (2) 1848—1849年 (3) 1850—1856年。

282

在第一个阶段，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是解决东方问题。在第二个阶段，因欧洲发生了革命，所以沙皇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是镇压欧洲革命运动。第三个阶段，是把欧洲革命运动镇压之后，又转而解决东方问题。

### (1) 东方问题

19世纪30年代革命问题已属次要，欧洲革命的第一阶段已经过去，而第二阶段尚未到来，革命正在聚集力量。国内局势亦然，十二月党人的第一次革命进攻失败了，新的革命形势又未到来。所以东方问题提到了首位。

东方问题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是“把土耳其怎么办？”的问题。19世纪前半纪土耳其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极其落后；国防力量薄弱；而且还有民族矛盾。君士坦丁堡（今之伊斯坦堡）与博斯破鲁斯及达达尼尔两海峡是使外国侵略势力最为垂涎之物。马克思、恩格斯曾将君士坦丁堡喻作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一座金桥。

东方问题对俄国说来，自喀德林二世起就已成为尖锐的问题，

此后长时期来自日程上取消。谋求君士坦丁堡与两个海峡是“俄国的传统的政策”。达此目的俄国就可由黑海自由去到地中海，加强与世界市场的联系。而且南疆的国防也可能得到巩固。俄国在东方问题上也遇到了一些劲敌，如奥地利、法国、英国、而以英国为主。俄国在解决东方问题上有些方便之处，利用巴尔干半岛上斯拉夫各族人民的解放运动来反对土耳其。东方问题与革命问题的联系还表现在，若是沙皇俄国取得胜利，那会加强其“国际宪兵”的作用。马克思与恩格斯曾言道：俄国一旦掌握土耳其，其力量几将倍增，她且将强於余下之整个欧洲。事情之如此结局对革命事业会是难以名状之不幸。”

19世纪20年代初，希腊发生了反对土耳其压迫的起义。

土耳其镇压了起义。沙皇政府为了巩固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便积极干预希腊事件。英国不愿让俄国增强势力，便与俄国在1826年订立议定书，1827年改为伦敦协定，决定让希腊自治。这样，就引起了土耳其政府的不满。1827年10月俄、英、法联合舰队开进那瓦林港，与土耳其舰队发生海战，土舰损失重大。因此土耳其更加敌视俄国。当时由于俄国正在进行对伊朗的战争，所以没有立刻同土耳其发生冲突。1828年俄伊战争结束之后，俄土之间就发生了战争。

这次俄土战争是开始于1828年4月，结束于1829年9月。军事行动同时在两个战场开始。俄军10万渡过多瑙河后受到土军强烈抵抗。只是在1829年库列夫卡(Кулевца)总决战之后，俄军才占领西利斯特里亚(Силистрия)越过巴尔干山，夺取了布尔加斯(Бургас)。8月亚得里雅那堡(Адрян-ополь)土军不战而降俄军并准备进攻君士坦丁堡。高加索战线俄军进展更为胜利。土耳其只得求和。

1829年9月在亚得里雅那堡签约。俄国得到多瑙河口及附近诸岛屿，黑海东岸的土地(至巴统——Багьми)。土耳其同意格鲁吉亚与阿尔明尼亚划归俄国，并允许希腊、摩尔达维亚、瓦拉希亚、塞尔维亚自治。俄国及外国商船可以自由通过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俄国臣民有权在土耳其境内自由贸易。土耳其赔款3450万金卢布。

在30年代「东方向题」更加尖锐。1831年土属埃及的国王穆赫默德·阿利与土耳其发生冲突，拒绝向苏丹纳税，并要求，苏丹把塞尔维亚给埃及，同时进军君士坦丁堡。埃及的行动得到法国国王支持。土耳其苏丹没有办法，只得求救于俄皇尼古拉一世。尼古拉一世认为这是占领海峡的好机会，就立刻派遣舰队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并在附近登陆，阻止了埃及军队。这时，英国极感不安，一来它不愿意埃及国王强大，二来不愿



2102

意俄國艦隊佔據海峽。因此，英國積極調解土、埃之間糾紛，要它們達成協議，要俄艦撤離海峽。法國支持。在英法壓力之下土、埃達成協議。

俄艦不得不撤離海峽。但在撤離之前，俄土之間於1833年7月簽訂溫加爾、伊斯克利西條約。條約，俄土訂立攻守同盟八年，一旦土耳其需要援助，俄國就出兵援助之，並規定達尼爾海峽和博斯普魯斯海峽除俄國艦隊外，不許他國艦隊通行。俄國有權保護土耳其境內的基督教臣民。這一條約引起了英、法列強強烈的抗議。1840年在倫敦召开了英、俄、普奧四國會議，訂立協定，把土耳其置於四國「共同保護」之下。

但亞得里亞那堡和約巩固了俄國在巴爾干半島的地位，因此更加深了俄、英、土之間的矛盾。英土曾企圖利用高加索山地居民的民族解放鬥爭（1834—1859年）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立足於高加索，但由於沙皇政府鎮壓了山民的民族解放運動。因此，英土的目的就沒有達到，列強之間在東方問題上的矛盾仍舊存在。

## (2) 1826—1828年的俄伊戰爭

19世紀上半葉，高加索和南高加索為俄國，伊朗和土耳其所佔據。俄國統治着格魯吉亞和阿塞爾拜疆等地，伊朗統治着東阿爾明尼亞，土耳其則佔據着黑海東岸的部分土地。當時的高加索和南高加索居住着許多种族的人民。這些土著的山地居民還處於半開化的部落聯盟時期，或者封建割據時期。這些土著山民，常常受到伊朗和土耳其的挑唆，起來反對俄國。而俄國則是積極地想征服高加索和南高加索。

俄國在击潰拿破崙之後，就開始最後征服高加索。俄國首先征服了高加索東北部的兩個地區——達格斯坦和車臣，並由高加索向南推進。這樣便引起了俄伊戰爭。戰爭經過是這樣的，1826年7月伊朗在英國支持下進軍南高加索，並繼續向格魯

2112

吉亚进军。札驻在高加索的俄军在叶尔莫洛夫的率领下对伊朗军队予以回击。俄军得到阿尔明尼亚人民的支持，把战争转移到伊朗本土上去了。1827年10月俄军占领塔弗里斯，威胁了伊朗的京城德黑兰。伊朗政府无力抵抗，遂于1828年2月同俄国签订了土尔克曼柴和约。按约，伊朗佔有的阿尔明尼亚部分划归俄国，俄国在裡海有驻扎军舰权；俄国得到12000万卢布的赔款。

1826-1828年的俄伊战争使阿尔明尼亚摆脱了伊朗的统治而归併于俄国，这对于阿尔明尼亚的经济文化发展有重大的进步意义。这一战争使得俄国在东方势力加强了，这对打击了英国在近东的扩张计划。所以英国极为不满。1829年由于驻伊朗的英国军队的帮助，在伊朗的京城德黑兰发生了謀刺俄国使馆人员的事件，俄国偉大的詩人格利波也夫夫也被刺杀。沙皇政府因痛恨这位詩人，便没有同伊朗政府决裂。

(3) 1848年的欧洲革命与尼古拉一世。

1848年欧洲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沙皇的视线由东方转到了西方。1848年2月巴黎发生革命，波旁王朝被推翻。接着在柏林、維也納、意大利、匈牙利、波兰、捷克等国家也发生革命，已具有独立的細領的無產階級也参与其中。欧洲沉入了民族解放斗争的火海。沙皇在宫廷舞会上得知巴黎革命的消息，揚言要以大軍镇压巴黎革命。但吴普、奥因本国革命不能成为沙皇的帮兇，波兰也发生了民族解放的起义，况且俄国内革命运动也迅速发展起来。在此情况下，尼古拉一世首先採取措施制止本国内可能爆发的革命，屯集40万大軍於西边国境，以防止居民（波兰、波罗的海岸、乌克兰）起义，並随时准备越过日境，执行国际宪兵的义务。

法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是巴黎的6月起义，起义由于没有得到农民的支持而失败，这一失败成为欧洲反动阶级转入进攻

122

的信号，各处革命都陷入失败或低潮，唯有匈牙利的民族解放斗争高潮起来。1849年4月匈牙利宣布为“欧洲自己独立国”。革命军队向维也纳推进。匈牙利革命的成功将会推动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走向高潮。奥皇无能为力，只好求援于沙皇。沙皇派出14万军队进攻匈牙利的革命。欧洲其他国家采取不干涉态度。

匈牙利革命军腹背受敌，处境困难。领导者之间有了分歧，部分人主张对沙俄宣战，号召匈牙利举行全民起义，向全欧洲人民呼吁，共同起来反对沙俄。这在匈牙利说来必须是进行彻底的反对封建的农民革命。但大部分人反对，特别是革命军总司令格尔该伊（Geyrei）不加支持，主张投降俄军，主张派胜利，革命军解除武装。沙皇将所有革命者交给了奥地利政府。4人枪决，9人绞刑，386人判处徒刑。

沙皇是绞杀匈牙利革命的刽子手，然而俄国人民的优秀代表如卓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都是同情、拥护匈牙利革命的。

甚至俄军军官中亦有同情革命，而投向匈牙利革命军的，如赖雪夫（Рычев）。现在布达佩斯还能见到他的塑像。

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结束了，开始了资本主义发展相对的和平时期。沙皇俄国的宪兵作用使他国际地位加强了。

总起来说，尼古拉一世的政府在1825—1850年这一时期内的对内、对外政府都是尽量窒息自由思想，镇压革命运动。因此，国际无产阶级的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欧洲工人阶级和欧洲民主主义者指出，尼古拉一世的专制制度是一切文明世界里主要的反动堡垒，不消灭它，欧洲的革命便不会成功。

## 第二十四讲

19世纪30—40年代的群众运动和社会政治斗争

(I) 30—40年代的群众运动。

(2) 1830—1840年代的思想斗争。

参攷书·苏联通史二卷八章三五节

九章四二节

赫尔岑<sup>1</sup> 苏联大百科全书<sup>1</sup> 选译，

人民出版社

别林斯基<sup>1</sup> 同上

纪念盖尔村<sup>1</sup>，列宁文选两卷集<sup>1</sup> 第一卷

第785—791页



## 第二十四讲

## 19世纪30—40年代的群众运动和社会政治斗争

## (1) 30—40年代的群众运动。

在19世纪上半期俄国封建农奴制体系的危机日益加深。这表现在农民群众为突破旧的生产关系——封建农奴制的生产关系而展开积极的斗争。沙皇政府虽然在镇压十二月党人运动之后，从各个方面来加强反动统治，但群众性的人民运动却在开展着。30年代—40年代，群众运动的规模巨大。按统计，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1825—1854）之内，共发生过674次农民骚动。根据伊格纳比维奇所著的《1861年改革前夕的农民骚动》著作中的官方数字来看，1835—1839年内计有78次农民起义，1840—1844年内有138次农民起义，而自1845—1849年内则计有207次农民起义。这就是说，从1835年至1849年，农民运动的数字增加了一倍多。

这时期农民运动的形式极其多样，除了杀死地主和管家之外，还采取拒绝服役，拒绝缴税，要求迁居，进行游击战等形式。例如，1832年在中央黑土地带各州的农奴中间发生了群众性的迁居运动。这个运动的起因是对政府的一道法令曲解的结果。1832年政府颁布了关于志愿移居高加索的“自由身份者”法令，于是在这些州的农民之间流传着一种谣言，认为只要去到高加索便可得到自由。因此，引起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政府动用了武力才镇压下运动。

又如，1847年在维特布斯克州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当时谣传说：农民如果去修筑彼得堡—莫斯科的铁路，期满三年，就可以摆脱农奴地位的束缚。于是，整村的农民变卖了自己的耕牛、房屋及财产去到彼得堡州。第三册在给沙皇的报告中说